

第二章

海军建军会议

制定三年建设计划

一九五〇年八月，我们召开了海军建设史上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当时把这次会议称作海军建军会议。

会议从十一日开到三十日。参加和列席会议的有海军和华东、中南军区海军的领导同志，有大连、南京两所学校和海直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共二十余人。

打算召开这次会议，我曾当面向当时任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同志请示过，随后写了正式书面报告。

会议之前，我们认真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我和海军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多次在一起交谈，商定会议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六月下旬，海军党委开了第一次会议。那时的党委成员是军委指定的，就是我们几个领导人。我们都来自陆军，都不懂海军，但热情都很高，都有决心把工作做好。我们在一起回顾了调来海军几个月的工作情况，谈了自己

对如何开展工作的一些看法。一致感到，海军初建，有大量日常工作需要处理，但海军领导机关是个决策机关，必须首先着眼于解决那些关系海军建设的带全局性的问题，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成天忙于事务。

对于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分工，大家进行了分工。其中工作量较大，也较复杂的问题，是根据军委指示，要在会前制定出一个三年建设计划(草案)，以便提交会议讨论通过。当时分工由罗舜初同志具体领导和组织这项工作。我的任务虽然是抓总，但很大精力也放在这项工作上面。要负责对上请示报告，要同大家一起商谈制定计划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依据，还要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

六月三十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天，周恩来总理把我找去，向我转达了中央对当时形势发展的估计和我国的态度。他说，这一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但也有好处，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他具体指示我们，假如以五十万人打台湾的话，即使分两次运，海军也还要准备几十万吨船。他说，我们看待当前的形势，“惧无根据，喜不麻木”，才是正确态度。我向他汇报了当时的工作，打算根据军委指示，制定一个三年建设计划。他听了表示同意我们的打算。

七月十三日，朱德总司令给我们写来一封信，提醒我们，要加强海军建设，“就必须有造船厂，飞机厂”，“有了这两种厂能自造还不够，必须要有石油厂、才能强化起来”，“你们应有计划的请求燃料部，在三年至五年内，必须要设油管”。几天以后，我又专门去向他请示过一次工作。我先向他汇报了我们的拟制三年建设计划的初步设想，他听了很高兴，还作了不少重要指示。他说：“应该利用现有的时机和兵力，首先把沿海海岸各要地及岛屿的防御工事、防御设备建立起来；把各基地组织起来。这一任务应成为当前的工作任务，且应成为首要任务之一。”“不能单从打台湾打算，而忘记了海军的基本建设”。他再一次提醒我们注意解决燃料问题。他给我们出主意，说：“向军委打个报告，要求重工业部注意发展燃料工业”。他强调“中国地方宝贵，寸土都要保护”，海军的“防卫在海上”。他提醒我们“招兵要注意招收水性熟悉的人”，海司要“在海上建立生产、建立家务”，等等。

周恩来、朱德同志的上述指示，不但为我们当时观察形势和制定三年建设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对海军的长远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计划中确定了在三年之内要建立多少支舰队，多少个航空师，多少个海岸炮兵团，规定了自造、改装和购置的舰船、飞机、岸炮的数目；确定了要建设起多少个基地、水警区、巡防区，修建多少个码头、仓库、机场、阵地，

等等；还确定要开办哪几座学校，培养出多少万名干部。总之，计划为海军在三年之内各方面的建设，描绘出了一副令人可喜的蓝图。

在拟定计划时，对于怎样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依靠外援的关系，经过大家讨论，提出了一条重要原则，并把它写进了计划的第一部分。这段话的原文是：“三年建军中必须从自力更生的思想出发，但又必须争取外援。所需舰艇，除非十分必要从外国购置外，力求自己修装、改造及自造部分船只。因此，建议政府发展造船工业，整理充实现有之江南、大连、黄埔、青岛等造船厂，并请求将黄埔、青岛二厂及上海修理厂移交海军作专门修理船只，及制造小型舰艇用。”“为了解决燃料困难，建议政府开采油矿，恢复及发展现有石油及柴油制造工业，以求部分解决海空军燃油需要。”

计划（草案）制定出来以后除上送军委以外，我们还于七月十九日给周恩来总理上送了一份，请予审核，并附信说明：我们制定这一计划的基本依据是“目前我国经济条件，结合执行作战任务之最低需要”。周总理审阅后，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就在会议正式开始的前一天，他和聂荣臻同志一起，把罗舜初同志找去，作了许多指示。他指示我们“现在要集中力量搞好三个修船厂，青岛，上海，黄埔”，要求我们把各船厂的情况和各类器材开具清单上送给他。他亲自批准成立招生小组，招收数百名大学生，输

送给海、空军院校。他还批准从地方抽调几十名翻译给海军。他关心得这样具体，使我们很受感动。

会议认真讨论了三年建设计划(草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获得一致通过。上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审批以后，便开始执行。

在以后的几年里，计划中列举的不少项目，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对海军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情况的变化，其中也有一些项目，特别是购置舰船、飞机，添置设备等方面的项目，都落空了。原因主要在于缺乏资金。原来在我们制定计划之前，军委曾将这年年初毛主席、周总理在莫斯科签订的三亿美元军事贷款的一半(一亿五千万美元)，拨给我们使用。我们当时非常高兴。计划中需要购置的武器装备和打算修建的军事设施，其经费来源便是靠的这笔钱。没想到，计划制定以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朝鲜战场上迫切需要的是战斗机和其他装备。国家财力有限，海军的建设一时顾不上了。这笔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用于空军购置飞机了。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当时的头等大事，我们当然愉快地服从了中央军委的决定，把海军建设中的不少项目，往后推延了。记得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这两年实际执行的结果，海军建设从原先确定的这笔经费中，只开支了约两千万美元。

在这以后的几年里，我们还曾制定过几次海军建设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多是没有完全实行，中途就改变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仍然是因为形势、任务的要求与国家财力之间往往出现矛盾，也就是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矛盾。例如，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我们制定了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经毛主席于十二月三日批准；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又提出了一个五年计划，中央也于五月二十九日批准。这些计划都是我们根据抗美援朝战争虽然还在进行，但我国沿海斗争的形势也很紧张，需要加强海上战斗力量建设的要求而提出来的，但都因情况变化，限于财力，国家需要优先办其他事情，把海军建设挤到了最次要位置，计划也就只得中途变化了。直到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我们又制定了一个新的五年建设计划，但是计划还没开始实行，又因要服从国家工业建设这个重点，需要改变。好在这时我们已经有了和苏联签订的“六四协定”所提供的三年军事订货作基础。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以这三年订货作为五年计划的内容，对原计划只是作了压缩、修改。这个计划后来基本上得到了实现。

在制定计划问题上的这种曲折情况，反映了海军建设初期所走过的崎岖道路，几乎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想把海军建设搞上去，真不容易啊！当然，这种曲折和反复，也为我们在这以后继续制定海军建设计划，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制定海军建设方针

八月建军会议着重讨论了“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海军”的问题，为海军早期的建设，制定了一条明确而具体的方针。

早在一九四九年秋天，毛泽东主席就为当时的华东军区海军写下了“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够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的题词。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他又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在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毛主席的题词和讲话，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建设自己海防力量的坚强决心，明确规定了海军建设的规模，提出了人民海军的根本任务。我们把这些指示，看作是海军建设的总方针，是我们长期奋斗的大目标。在这一总方针和大目标的指引下，我们还要不要制定出海军近期建设的具体方针，以便引导海军全体指战员共同奋斗呢？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很有这个必要。

前面已经提到，对于“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海军”的问题，从受命组建海军开始，我就在考虑。当时世界上的海军强国，主要有三个国家：英、美和苏联。英、美建立的是大型的、重型的海军，有庞大的舰队，有排水量达十万

吨的航空母舰，有续航力很大的巡洋舰。苏联海军也是大型的、重型的，也有航空母舰、巡洋舰，等等。我国的国情不同，作战任务也不一样，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象他们那样去建设庞人的舰队。这样，在海直机关成立大会上，我就讲了要建立一支轻型舰队的初步想法。随后在制定三年建设计划时，在一份电报中又提出，要“以飞机、潜艇、快艇三项为重点”。这些想法提出以后，许多同志表示赞同，认为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海军，不能只凭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必须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我们自己的愿望来说，当然希望把一支非常强大的海军很快建设起来，但这是不现实的、办不到的。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认真进行了探讨。认为确定只能建立一支轻型海军的方针，主要依据有两条：

一、我军执行的是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却是进攻的。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指望得到别人的一寸土地，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海防，保卫祖国的安全。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战术上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寻找战机，打击和歼灭敌人。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作战任务是：协同陆军继续解放沿海岛屿；加强警戒，保护海上交通，保护渔业生产；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解放台湾，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完成这些任务，都不需要我们远离自己的国土，我们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主要是在近海。作

战时我们有漫长的海岸线和星罗棋布的岛屿可以作为依托。这些特点和有利条件，决定着我們不需要建设庞大的远洋舰队，但又必须尽快建立起一支坚强的海上战斗力量，以便胜利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各项战斗任务。

二、我国经济落后，工业，特别是造船工业基础薄弱。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刚刚解放，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没有也不可能拿出大笔经费来用于海军建设。再说，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基础，没有专门的技术人才，即使有了钱军舰也是造不出来的。制定海军建设方针，也不能不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

到会同志发言很热烈。有的说：“我们要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只能是一支富有攻击力的轻型舰队。这样一支海军，建设起来花钱少，见效快，是我们有把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设起来的。它又短小精干，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能适应我国海防斗争的需要，完成当前和以后一个时期的海上作战任务。”还有的同志说：“我们必须反对和帝国主义海军比吨位的观点，克服轻视轻型舰队、惧怕帝国主义大舰的思想。最近朝鲜人民海军的轻型舰队击沉了美帝的巡洋舰。这一事实说明，轻型舰队能够打败大舰，认为只有大舰才能打胜仗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在会议总结中，我集中和概括了大家的意见，提出：“海军建设的方针是精干的方针”，“我们在三年之内不可

能建设大型的海军，只能建设一支现代化富于攻防力的精干的轻型的海军力量”。这次会议以后不久，我们又进一步完善了关于这一建设方针的提法，具体措辞是：“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于攻防力的、轻型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和发发展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以发展鱼雷快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

对于这一建设方针，当时我曾多次指出，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它强调现代化。这首先是指海军的技术装备，必须高度科学化，具有现代先进水平；其次是就海上作战来说，现代化的海战必然是一种立体战争，又是一种综合性的战争。必须把海空的飞机、海面的舰艇、海里的潜艇和海岸的炮兵，组成一个协同配合的整体力量，缺少哪种力量在战争中都可能要吃大亏。二是它强调要建立“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要以空、潜、快为重点。这支力量具有航速大、隐蔽性好、机动性好、攻击威力大等优点，最适合于近海作战，平时便于分散训练，战时易于集中机动使用。这一特点区别于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军，是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的战略方针的。我们当时估计，这支力量建设起来以后，它不仅单独完成反封锁、维护航运、保护渔业生产、消灭海匪、进行布雷和扫雷等战勤任务，而且可以配合陆、空军，进行渡海作战，完成解放沿海岛屿，以及切断敌人海上交通

运输，抗击敌人登陆等等作战任务。三是它强调要以现有力量为基础。在当时的条件下，离开现有的力量，新的力量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当时拥有的一些舰艇和其他装备器材，虽然老旧，但短时间内还不可缺少。利用它们，既可担负剿匪、护渔、护航等任务，又可培训干部和技术人才。

这一建设方针，当时即报告了中央军委。以后中央军委一些领导同志在讲话中，也提出了同样或类似的意见。例如，一九五四年五六月间，彭德怀副主席在视察山东沿海的设防情况以后，谈到海军建设问题时，说：“海军建设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毛主席指示的方针问题。在建设的步骤上，……我们应当先发展鱼雷快艇、潜水艇、快速炮艇、布雷艇、扫雷艇、驱潜艇。建设一支数量多、吨位小，适合于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的海军。然后在各种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再发展较大吨位的各种战舰。”在这年年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同志在讲话中更是明确提出：“海军建设应以鱼雷快艇、潜艇和水鱼雷轰炸机为重点。”

实践证明，这条建设方针，不仅对于海军开始几年的建设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保证部队胜利完成了当时担负的各项战斗任务，而且在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的基本精神也仍然是适用于海军建设的。特别是方针中提出要“发展鱼雷快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后来

更明确提出“以空、潜、快为重点”，即使到了今天，这一基本思想，仍然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制定海军建设的组织路线

会议着重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建设这支海军，主要依靠哪些力量？他们在海军建设中各处于何种地位？

这个问题的提出，最早是华东军区海军在组建过程中，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冬天在配备上舰人员的时候。当时部队成员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解放军来的工农分子，二是起义、投诚的原海军人员。华东军区当时提出的配备舰员的原则是：“以解放军为基础，团结改造旧海军人员。”这个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引起了原海军人员的不满。他们认为，从解放军来的工农同志是“土包子”，文化低，不懂技术，没有资格作海军建设的基础。有的原海军人员，甚至在配舰前，就以他们自己为主，把上舰人员名单拟好了。而来自解放军的一批工农同志，由于不懂技术，自己也缺乏“为基础”的信心，有的竟提出要“以原海军人员为骨干”。最后在配备舰员时，虽然坚持了“以解放军为基础”的原则，规定上舰人员的比例是“解放军占三分之二，原海军人员占三分之一”。但是，人们的认识并没有统一起来。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重视，认为它不仅是个配舰人员比例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海军建设中一个重大的组织原

则问题、路线问题。它关系着海军建设能否保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和根本方向，也关系着能否把各种力量协调一致地组织起来，充分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我们把解决这个问题提到了建军会议上。经过深入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为海军建设制定了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当时也称它为建军路线。它的全文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科学技术人员”是在一年后召开的海军首届政治工作会议增加的），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

这条组织路线一开头就指明了人民海军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是因为，“党指挥枪”历来是我军建军的一个根本原则。海军的建设必须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会有团结一切力量的坚强核心，才有可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民子弟兵的阶级本色。“以解放军为基础”，不仅是指海军的基本成员是来自人民解放军陆军，更重要的是说海军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包括它的建军宗旨、党委和政治工作制度、优良的工作作风和战斗作风，等等。这一规定，既符合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符合毛主席在全国首届政协会议报告中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必须“以解放军为基础”的具体指示，又反映了组建海军是从陆军抽调来部分机关和大批干部战士的实际情况。

强调“以工农为骨干”是针对当时部队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提出来的。当时来自陆军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出身工农，本质好，又经过了长期的战争锻炼，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观念，较好地继承了我军的不少优良传统，但由于文化低，不懂技术，普遍感到腰杆子硬不起来，而在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和原海军人员中，确有一些人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对他们不服气。针对这种情况，大家认为，必须为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撑腰，强调他们是海军建设的骨干力量，激励他们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至于文化和技术，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提高，工农分子是可以知识化的。这一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阶级本色，大大鼓舞了工农分子干好海军的信心，同时也否定了那种瞧不起工农的不正确看法。

海军是一个技术高度复杂的军种。没有大批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和有真才实学的专业技术人员是不行的。而在当时，我们各方面的人才都非常缺乏。记得海军工程部门当时拥有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总共才有十多人。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我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从地方抽调技术人员支援我们。二月二十三日，薄一波副总理写信告我说：

“业经总理批交我办。现值国家大建设开始，技术人员需要量很大，各方都很感缺乏，海军所提的技术人员，有的根本没有，为不影响你们各方面的工作，拟请你们把数字再压缩一下，以便和各部门协商抽调”。后来，政务院费了

很大力气，在半年之内，也只从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交通部和铁道部调给了海军工程师九人、技术员三十七人，远远不能满足海军建设的需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主要还得靠自己培养。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主张加速培养工农分子。这固然是办法之一，但是，单纯用这个办法来培养人才，不但数量有限，而且工农同志要先学很长时间的文化的，才能钻研专业技术，对当时的海军建设，是“远水不解近渴”的。我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极力主张，在不放松培养工农分子的同时，要从外部吸收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到海军来。这一分歧意见，最集中地反映在海校招收学员的问题上，即：主要应从海军内部招收工农分子进行培养，还是要从地方院校招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当学员，以便尽快掌握海军专业技术。经过商讨，大家的认识统一到后一种意见上来了。普遍认为，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是培养海军建设人才的一条捷径。往后海校招收学员，除了从海军内部招收一部分文化较高的工农分子以外，主要都是招收的地方高中毕业生和工科院校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后来的实践证明，会议把“吸收大量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列为组织路线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一项有远见的决策。它对开辟人才的来源，壮大海军的科技队伍，提高队伍的科学文化和军事技术水平，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的。

原海军人员当时人数不很多，但它是海军建设中的一

支重要力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原国民党海军舰艇上的起义官兵，有着程度不同的爱国主义和追求进步的思想，而且文化高，懂技术。但是有些人对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有些人存在着雇佣观点，不少人身上还有着较浓厚的旧军队习气。怎样对待这支力量呢？会议认为，既要积极团结和争取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当时海军建设的需要；又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改造思想作风，克服缺点，不能采取放任、迁就的态度。因此，组织路线就毫不含糊地提出要“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这不仅有利于海军建设，也有利于他们自身的进步和成长。

这条路线制定出来以后，我们在各种会议、刊物上广泛进行了宣传，反复阐明它包含的思想内容，讲清制定它的依据和重要意义，使得全军上下人人皆知。接着，海军党委和各级组织为使这条路线落到实处，普遍做了大量工作。这方面的情况，我在下章里，还将谈到。

贯彻落实这条路线，对于海军创建时期的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其中最明显的：一是它给各级领导搞好组织建设提供了一个统一思想的准则。无论是组建新的机构，还是平常调配使用干部、选调学员，大家的思想认识都比较一致。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哪些部门需要吸收新鲜血液，物色专业人才，各类人员该安排到哪个岗位，大家都能想到一块。开始时往往意见分

歧、各执一词一类现象，大大减少了。二是它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的团结。它象一条红线一样，把海军建设的各种力量连结在一起，在各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下，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各类人员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互不信任、互相瞧不起一类思想得到了克服。工作不协调、力量互相抵消的现象，大大减少了。三是它使各种力量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海军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大大增强了工作责任心，调动了工作积极性。工农同志以身作则，努力掌握技术业务，在各项工作中自觉起骨干带头作用；知识青年和原海军人员也都发挥自己文化高、懂技术的优势，自觉改造思想，学习和继承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为加速海军建设努力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队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成员之间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我们的组织路线当然不能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在海军建设初期，针对当时情况制定出这样一条组织路线，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果当时不提出这样一条路线，部队的问题必然会更多，许多工作也会难做得多。

关于向苏联海军学习

建军会议还认真讨论了我们建设海军要“以谁为榜样”的问题，号召全体指战员“向苏联海军学习”。

对于为什么要向苏联海军学习，我在这次会议总结中讲了五条理由：“一、苏联海军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和马列主义的长期教育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二、苏联海军有长期的建军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作风。三、苏联海军是在与帝国主义作战中有了丰富经验的。四、苏联海军是有人类先进的科学作基础的。五、苏联海军建军的阶级性是与我们完全一致的。”一句话，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科学技术上，苏联海军都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这一概括，反映了与会同志当时的看法。

号召提出以后在部队中却引起了一些不同的议论。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原海军人员。他们对于只提“向苏联海军学习”，不提向其他强国的海军学习，不大理解，有的甚至存在着对立情绪。他们主张，应该改为“政治上学习苏联，技术上学习英、美”。对于学习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海军的先进技术，我们当时也并不排斥、反对，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要号召向他们学习，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确的。在会议总结中，我在谈到向苏联海军学习的问题时，曾这样谈过：“以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为思想，发扬我军光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总结我们建军的经验教训，很好的向苏联学习，同时，也要研究敌人，改进自己。”这里说的要研究的“敌人”，其中就包括当时敌视我国的一些资本主义海军强国。这些海军强国，当时正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等种种敌视政策，千方百计对我进

行诬蔑和破坏，妄图把我国革命扼死在“摇篮里”，哪里还会把先进经验传授给我们呢！对于他们的建军经验和技術上的长处，当时我们只能依靠很有限的一点资料，进行研究，根本没有可能号召广大指战员都来学习。另外一种议论，来自我们一些从陆军来的工农同志。他们说：“过去我们不学习苏联，不是照样打胜仗吗？怎么现在要这样强调学习苏联呢？”这些同志不了解，我军从诞生的那天起，不少东西就是从苏联红军那里学来的。毛泽东同志就说过：

“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不同的是，现在这个问题显得更突出、更重要了，特别是我们海军，从无到有，平地起家，凭老经验和光靠自己摸索都是不行的。只有很好学习和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才能尽快地把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海军建设起来。

针对部队的模糊认识，我们海军和各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在以后的会议讲话和在《人民海军》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都强调必须向苏联海军学习。反复说明，中国革命“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向苏联学习，争取苏联援助，在全国来讲，都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对于海军建设这个局部来说，就更加显得重要。海军党委提出向苏联海军学习，既是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要把苏联建军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这一号召的实际行动，更是海军建

设的迫切需要。经过深入的思想动员，“向苏联海军学习”的活动开展得很普遍，很有声势，并且持续了许多年。

向苏联海军主要学习哪些东西？在这次建军会议上没来得及作明确规定，也没作什么解释。随着学习活动的开展，我们提出了不仅要学习苏联海军的先进科学技术，还要学习他们的政治工作，学习他们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和工作作风，等等。到后来便发展到强调要“全面地”向苏联海军学习。对于这个口号，当时我们作了不少解释，一再肯定它的正确性。但是今天看起来，这一提法是不合适的。它容易给人以错觉，似乎苏联海军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值得我们学。它还容易使人把学习苏军先进经验和坚持我军的优良传统对立起来。当时就有人这样认为：既然要“全面地”学，就应该取消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象苏军那样实行“一长制”。个别的甚至提出为什么不学习苏军每天啃面包、搽香水一类生活方式。而在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我们向苏联海军学习的主要还是军事技术，和它的规章制度。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政治工作方面，我们还是坚持了我军的一套优良传统的。

向苏联海军学习，最直接的方法是向当时我国聘请来的大批苏联军事顾问、专家请教。最早的一批苏联专家，是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八十四人，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到达沈阳，随即被送往大连海校，帮助建校办学。第二批是同年十一月，随当时的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同志访苏回

国时带来的六人。我到海军任职后，每年都要聘请来一批，多则几百，少则几十人。直到一九六〇年，累计达到三千三百九十余人。当然，每年都是有来的，也有走的。一般在我国工作一二年，有的工作几个月也就走了。顾问、专家来了，我们就把他们分到了各个部队、各院校、机关各部门，分到学校去的最多。在海军领导机关，除司令员、参谋长各有一名顾问以外，各业务部门也都有顾问。当时给我当顾问的称为总顾问(或称首席顾问)，以后又称专家组组长。先后任过总顾问或专家组长的有库兹敏、涅斯切罗夫、阿夫古斯契诺维奇、普拉东诺夫、哈尔拉莫夫等五位将军。最初同我打交道的是第一任顾问库兹敏，任期最长的是第三任顾问阿夫古斯契诺维奇，他在我国工作了四年。他们经常向我谈情况，提建议，我有难以决断的问题，也找他们商量。我们对苏联海军部有什么要求，苏方如何答复，有时也是通过他们转达。

当时来华的顾问、专家，对我们的态度是热情友好的。他们那种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的一套是正确的，处理问题往往比较主观、武断，不大考虑我国的国情。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的干部有时也沉不住气，双方就争论起来，有时争吵得很厉害。情况反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一般都是严格要求自己，批评自己的干部。因为专家都是我们聘请来的，关系处理不好，

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还可能影响到两国的友好关系。例如，有一次，航空兵的一位领导干部为一件事同专家意见有了分歧，专家坚持要按他的意见办，双方互不相让，大吵起来。这个干部质问专家：“斯大林那么英明，还讲军事民主！”“我是听上级的，还是听你的？”把这个专家气得不得了。事情发生后，我们一面向专家组的负责人解释，说明按照我军的传统，即使是上级，在作出某项决定之前，也往往要先听听下面的意见，意见正确的要及时采纳。希望专家同志今后同我们的干部研究工作时，多采取商量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发出通报，批评了这个干部，教育大家要认真听取专家意见。后来，我们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规定各大单位每年都要检查两次和苏联专家的关系。从这类事情上可以看出，我们当时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确是很虚心、很诚恳的。

向苏联海军学习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翻译出版苏联海军的条令。在我们自己还制定不出适合我军情况的条令以前，曾强调要按照苏联海军的条令办事。如舰艇条令，就是执行的苏联海军《舰艇条令》。这样做，是为了应付当时的急需。后来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具体问题，如值更值勤制度、起居作息時間，等等，都不大符合我军现有的装备条件和我军所处的地理环境，才适当加以变通。直到后来制定和不断完善了我们自己的《舰艇条令》，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为了造就出一批高级指挥干部和高级技术人才，我们还曾派出几批干部到苏联去留学深造，学习海军军事科学技术。记得在头三年内就分三批派出了一百六十多人到苏联去留学，同时还选派了近三百人到当时驻旅顺口的苏军潜艇部队学习。以后几年，又陆续派去了一些。这些干部都把这看作是向苏联海军学习的难得机会，学习态度都很认真刻苦。

在向苏联海军学习的活动中，我们海军几个领导干部，不但号召部队学，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在学习中起了带头作用的。因为当时我们很缺乏海军知识，不学就没有发言权和领导权。拿我来说，我总是—有机会就向苏联顾问请教。继一九五〇年冬天访苏考察之后，一九五二年初夏，我率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时，又利用机会，拜访了苏联海军十多位高级将领和部门负责人，请他们讲了许多方面的技术科学知识，介绍了他们建设海军的经验。主要内容有海空军的组成和使用、各种轻型舰艇的战斗与使用、登陆或反登陆作战的计划与组织、造船设计、舰艇的保养修理，等等。海军其他领导同志学习也都挺认真。刘道生、方强、张学思同志后来还被送到苏军院校学习了多年。

总的说，我们海军从一开始就重视向苏联海军学习的做法，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学习成绩是主要的。它使得海军广大干部战士能够比较快地获得多方面的海军知识，掌握海军技术；并为海军制定各项条令和规章制度，搞好各

项工作，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对于海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在学习过程中，由于我们处于海军建设初期，缺乏知识和经验，不能做到有选择地学，因而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的做法。有些东西学过来以后，在执行中又缺乏检查，没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学习外国外军的经验，既要有虚心求教的态度，又必须充分考虑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即使是很先进的东西，也不能照抄照搬。过去是这样，今后在向外国外军学习时，仍然必须牢记这一点。